

# 「日久他鄉是故鄉」之後呢？ -談新住民的語言教育發展的可能性

陳麗君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副教授

## 壹、前言

「日久他鄉是故鄉」是美濃「外籍新娘識字班」黎氏玉印(越南籍)作詞，交工樂隊鍾永豐/夏曉鶯作曲的歌。描述外籍新娘隻身來台結婚後，透過上識字班，藉著姐妹們的互助而能擺脫無助和孤單。而「外籍新娘」後來更名為「新住民」，是為了要以台灣為故鄉而歸化成台灣的住民。然而改了名稱之後呢？偏見和歧視就不再了嗎？本文從國際移民移動的前因後果切入說明台灣新住民的背景，並進一步說明性別和雙重身分的邊緣化，再藉著思考語言背後的權力和資本的運作，批判台灣尊重多元文化的假象。最後再從語言的角度出發，試著提出一個讓新、舊住民都能夠共榮共和的教育面相。

## 貳、本文

### 一、國際移民和台灣新住民一人為什麼移動？

人類自古就總是為了滿足生活的基本外在條件而移動，如食物、水源地、聚落易物之處。就像遊牧民族為了牧草地、農民尋求水源地、獵人尋找狩獵地、航海民族探尋漁場般一樣自然。近代人類移動史上，最大宗的移動莫過於 19~20 世紀初 5000 萬以上的歐洲人移居美洲新大陸，此外還有歐洲殖民帝國支配結束後殖民地人民「回流」移動、戰後歐洲產業革命時期大量的男性的勞工移動、70 年代以後基於人道主義勞工家屬赴歐美的「團聚」移民、以及難民移動等(King 2010; 伊豫谷登世翁 2001)。根據聯合國人口統計資料，2010 年移民人數約為 2 億 1400 萬人，相當於全球總人口的 3%。值得注意的是 90 年代以後移動的原因更加多樣化，其中最大的特色是國際移民的女性化 (パレーニャス 2011: 127; Gamburd 2000: 35; 澤田佳世 2008: 68; King 2010: 76)，她們又是為了什麼而移動呢？

女性跨國「出走」的工作內容主要是家務勞動、娛樂從業、非法工作、婚姻移民等(Piper & Yamanaka 2008)。因為在新自由經濟體制下，女性加入勞動市場，使得再生產(reproduce)勞動的市場需求擴大。而貧窮國家人口到較富裕國家的移動，已經不再像過去一般限於建設勞動業或是農業部門的男性勞工。比如說我們所熟知的菲律賓、越南等地區的女性，由南向北、自東到西跨越國族國家，滿足了世界各富裕國家低工資家事勞動的高度需求。工業化以及新興國家的發展促進了女性就業，但也導致這些新興國家的社會出現了再生產勞動的巨大缺口同時也造成某些農村地區男子難以找尋本國的婚姻對象，轉而尋求國外的對象如台灣、韓國和日本(王宏仁 2001; 夏曉娟 2003)。

相對於新加坡限制本國國民與外籍勞工、看護等之通婚制度，台灣政府相對地採取開放性的政策。根據戶政司統計資料(2016年2月)，目前台灣外籍配偶人口已經達到511,623人，總數接近台灣原住民總人口546,698人(原住民人數是根據戶政司2015年底資料)。其中外裔及外籍配偶166,456人占33%，其餘為中國港澳配偶345,176人占67%。一般我們所謂的外籍配偶主要是指來自中國或東南亞籍的女性，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透過興盛的相親活動而婚姻移民到台灣的女性。近16年(1998年~2014年7月)來台灣的結婚人次中，與外籍配偶結婚的平均比例約17%，在2002、2003年時達到3成的比例，也就是國人結婚之中每3對就有1對是和外籍配偶的婚姻。外籍配偶之中，中國人數最多，東南亞人口依人數的多寡順序分別為越南(90,381)、印尼(28,123)、泰國(8,408)、菲律賓(7,879)等(內政部2014年7月統計資料)，這些人口包括歸化(取得)台灣籍的以及外僑居留。自2004年至2013年的10年中，台灣國中、小學生人數自284萬人降至212萬9千人，但新住民子女學生人數卻從4萬6千人成長至20萬9千人，占國中小學生數比率也自1.6%快速增至9.9%。其中國小一年級新生人數近1萬9千人，平均大約每10個國小新生就有1個是與外籍配偶通婚的子女(教育部統計處2014年)。因此，作為移民接納國，除了挹注外籍配偶適應台灣生活的關心外，其子女的教育輔導也為我國重大課題。我國內政部在90年代初期推動的外籍配偶在台適應輔導政策以識字班(現為國小成人教育班)最多，2011年以後則開始新住民子女的多元教育方案。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就如同國內諸族群的「母語」教育不怎麼奏效一般，尊重多元族群差異多樣化的多語言教育一直無法有效開展。問題出在哪裡呢?以下，我們將在簡單的說明新住民所處的社會結構背景後，試著提出解決的方案。

## 二、邊緣化的性別和身分—雙重身分和勞動

婚姻移民女性替台灣提供了社會再生產的重要角色。所謂社會再生產指的是為了維持生產勞動力所必須的勞動力(Brenner & Laslett 1991)。我們可以將社會的再生產勞動分成兩類，一是指生物學上的人口再生產，另一類是指父權社會結構下女性責任制的家務勞動諸如家事、照顧老年人、成年人、小孩的日常生活及社會化、做為家庭的樞紐等工作。由於政府自1969年提出抑制人口政策、內政部發布實施「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以來，「提高人口素質、人口合理成長及均衡人口分布」的政策「成功」，配合優生保健的口號，台灣在80年代就進入少子化階段(蔡政宏 2007; 澤田佳世 2008)。再加上女性的高學歷化與高度社會參與，都是台灣低收入勞工階層以及繼承家產制務農男性婚姻困難的原因。而來自東南亞以及中國的商業婚姻移民正好滿足了維持台灣社會父權支配的生產(produce)與再生產(reproduce)所需的女性勞動力。

大多數移民到台灣的女性配偶除了負擔生殖的生產與社會再生產的勞動外，在父權的社會結構下，她們也被期待扮演稱職的「母職」角色--傳承並教育台灣語言文化給「新台灣之子」。其中最常見的典型論述就是期待她們用台灣語言教導並輔導其兒女課業。有不少新住民曾對筆者表示，家人讓他們上學(識字班)是希望她能學會「國語」，才能幫小孩做功課。但請讀者設身處地試想，初到人生地不熟的國外，在短短一兩年中學習當地語言達到與人溝通的目的已非易事，更何況使用初學的外國語教導其子女學業。但在父權社會結構作用下，這種不可能

的任務—海外生育>養育>教育在地語言文化的「母性天職」，卻常常理所當然的套用在女性新住民的身上。這些移民女性的雙重身分的勞動幫助了台灣人口少子化、高齡化、經濟上的生產，卻常常因為其中下層階級身分而被邊緣化。

### 三、來台後的語言使用--語言作為資本的權力競衡

貧富差距、社會階級等詞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但是一般人可能很少注意到語言也常常被人們不自覺的劃分等級。大家在學校選修外語課程時，英語、法文、日文常常是炙手可熱的科目，但是近鄰國家的越南文、印尼文、馬來文或菲律賓的塔加洛語呢？這樣的現象正如著名法國社會學家皮耶·布迪厄的著作《語言交換的經濟學》一書中所指出，話語本身就是一個語言交換的行為。話語的力道和權力並非由存在於該場域中的複數的語言和語言能力之間的關係所決定，而是由不同的行為主體，根據他們從各自的團體中所感知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所認知而承載的，不管這象徵資本是否制度化。而語言的價值取決於單一市場內的價格形成的法則來標示。端看各個語言行為者自身認為有用且愛好的產物(語言)的價值認定，是否也有能力也讓其他人有同等價值的認定。

有關國內的語言市場的狀況，筆者曾於2005~2006年間調查居住台南市內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的家庭，進行了一項有關語言「評價」的調查，以了解配偶雙方是否會花時間或金錢去學習配偶的母語。經比較國人與東南亞籍以及國人結婚人次僅次於東南亞國籍的日本籍之國際婚姻家庭，結果顯示，與日人結婚後的男性國人93%平均每周花3.6小時學習日語，女性國人100%平均每周花4.1小時學習日語，其日籍配偶有79%平均每周花2.8小時學習中文。至於與東南亞籍(對象包含越南、印尼、馬來、泰、柬埔寨語)通婚的男性國人卻無人學習配偶者母語，但72%的東南亞籍女性平均每周花2.5小時學中文或台語(陳麗君2011)。以上結果說明，同是國際婚姻在台灣，卻呈現落差極大的選擇性學習。對台灣人而言，日語的象徵資本遠高於東南亞語言，也就是在語言市場上一般人認定有用而且喜愛學習。然而，語言本身難道有高尚低劣或是有用無用之分嗎？當然沒有。即便很多人選修法文但從沒機會使用，學習者學習語言的動機主要是基於對該語言文化是否認同，這種認同的想像不見得建立在實際的需要上。

上述的語言位階分化現象，以社會語言學的說法稱之為雙言制(diglossia)，台灣社會普遍存在日文或某些歐美語言作為高威信語言(high prestige languages)，而東南亞諸語言作為低威信語言(low prestige languages)。再舉筆者親身經歷的另一個例子來說明。有天傍晚筆者到暑期夏令營安親班(就是那種以英文活動為主的大型連鎖補習班，雖然夏令課程內沒有英文課)接8歲的小孩放學回家時，隔壁座位的小男孩聽到我跟孩子的台語對話後展開的一段問答：

隔壁座位小孩問：你們怎麼講台語啊？

我笑笑回答：台灣人當然講台語啊！

隔壁座位小孩吃驚的說：我寧願說英文也不說台語！

我很誇張地把嘴巴摀住假裝出很吃驚的樣子。他停頓了一下後，

就告訴我：我真<sup>xī</sup>勢<sup>chín</sup>講<sup>kāu</sup>台語<sup>kóng</sup>喔。(漢字發音：挖金猴公台藝喔)

(注音表中文發音，羅馬拼音表實際台語發音)

這個例子展示了台灣話的位階價值以及在權力競衡下無時不刻都有改變的可能性。小孩是張白紙，單純反映出他所接收到的語言在市場裡的象徵價值。至於語言的象徵價值怎麼來的？簡單的說，影響力最大的不外乎是國家語言政策與歷史和媒體的形構。

回到我們和新住民朋友的談話，時常聽到的共同話題是，東南亞籍配偶說公婆不讓她們教小孩或禁止跟小孩講她們的話。隱含了兩個意涵：不願意讓小孩學東南亞語言、中文才是正統的；也怕小孩的中文會受媽媽的影響而有「腔調」。這也反映了現前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和實踐上的核心問題--尊重多元族群文化喊喊口號、吃吃越南米粉就是了，至於文化深層的語言學習就免了。我們在這裡撇開價值或位階等問題不談，首先要解決上述二個常見的迷思。一是對於學童而言，東南亞語言的學習不但不會影響中文的學習，反而有增強中文能力的可能性。現在的認知語言科學研究上已形成的共識是，多語言學習不但比單語言學習的認知成效高，還有助益於心智的發展。第二個迷思是，小孩的語言能力通常在 10 歲大約小學三四年級後就會穩定下來，在台灣教育體系下長大的小孩，要想讓他帶有東南亞語言特色腔調反倒是很困難的事。

#### 四、我的媽媽也是外國人—新住民語言作為資源

台灣有句話說「外國的月亮比較圓」，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北半球(歐、美、加、日等)的月亮比較圓」吧！如果大家都認為人類美好的未來生活不該加入種族歧視、貧富不均、社會階層的話，那麼新住民子女媽媽的母語也和歐美日韓等外國語一樣，也可以成為國家社會重要的資源之一。事實上，東協國家一向是台灣的重要雙邊貿易夥伴，近年來中國的投資環境變化加上東亞區域整合、東南亞產業鏈漸趨完備，現今台灣產業界的「新南向政策」已成趨勢。其實，早在 1994 年便有李登輝的南向政策，不過過去以來台商遇到的語言問題一直沒有能夠正面的、積極的獲得解決，當時正值 90 年代中國經濟崛起加上 2004 年後全面傾中政策，所以南向政策面對的問題一直不獲得重視。早期台灣對菲律賓的投資最多，筆者前年曾赴菲律賓訪問當地台商，幾位台商都認為在外地經營工廠與產業的最大問題便是工作執行時和管理上的語言問題。比較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找會當地語言的中國人當管理人員，但是這些人通常不堪信任。如果找當地翻譯人員卻常常因為不夠積極，在貿易的談判交易上達不到理想的效果。有位已經在外地經營 30 年事業有成的台商告訴我：

大多數到菲律賓投資的台商，比較安全但是不正派的方法就是找當地的「番婆」當「小三」，如此一來不但有人頭可以在當地設廠置產，經營管理上也都不用擔心，一舉兩得。但是這是運氣好的，如果運氣不好的遇到小三翻臉不認人就連房子車子都沒了。

相信讀者和筆者同樣，都認為以上兩種很顯然的都不是好方法。台灣國內如果能以新住民的語言作為重要資源，挹注適當的教育措施善加培養專業語文人才，

如此一來，也同時能提升新住民子女學習成效與正向的社會化，更可以達到落實多元族群文化的目標，也更能大幅度的促進我國在東協的貿易合作與發展，這才真是一舉數得。也有人說，全力推廣台灣語言到東南亞吧。這也是一個好辦法，東南亞各國如越南、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分散不少福建、廣東來的移民，所以有一些共同語言的基礎，學習門檻並不高。

要如何培養國內語文人才並推廣本國語言以作為國家政經發展的基石的好例可以看看日本。日本在越南等國投資金額位居越南外資的第一位，其在策略上除了積極培養日本國內越南語專業能力人才，2000年起的10萬人留學生計畫，挹注大量經費招收留學生(越南人數佔第4位)到日本，緊鑼密鼓的又在2001年JICA國際獨立法人機構在越南設越南日本人才協力機構(VJCC)，接著在交流協會以及各級企業的通力合作下，在越南廣設日語教育機關，從大學日語教育學科開始，邀請日本大學專業日語教授到越南培訓日語師資，接著開設大學附屬高中、國中、小學日語課程。以至於2016年3月起越南全國小學開啟以日語作為第1外語的制度。這樣的作為不僅是為了經濟利益，更是廣泛地得到文化上的認同。

## 五、多語言習得的可能性和方法

比起日本、韓國，台灣今後的優勢可能在於我們的新住民人口以及其第二代，讓我們更容易培養雙語人才。雖然2012年內政部開始「火炬計畫」以及2016年夏天全國新住民教學支援人員36小時培訓計畫正於各縣市如火如荼的展開(以國中學歷以上新住民為對象，進行36小時的培訓課程就能成為小學母語支援人員)。但台灣如何能夠成為歐洲的複語社會或者如加拿大利用雙語(或3語以上)沉浸式(immersion)教學來成功的保存語言，從目前的措施上看來似乎仍然路途遙遠。

由於過去我國對於婚姻移民家庭早期的政策，側重在同化教育，教導新住民識字使其歸化，以加強其子女的學業成就輔導。研究或媒體往往是站在單一領域以及同化視角下，提出家庭因素(弱勢政經地位等)對外籍配偶家庭之子女有不良影響，使之有自卑、情緒障礙和人際關係建構的困難，以及語文學習和認知發展遲緩等問題，並出現貶抑母親的歸因。然而加拿大雙語教育學者Cummins(2011)歸納造成少數族群學生之學業成就低落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教育者和少數族群學生之間的關係以及學校和族群社區的關係沒有得到顯著的改變。當我們從國際視角來研究少數族群學生學業成就低落的模式時，很明顯的，少數和多數族群之間的權力和身份關係對於學業表現有重大的影響。以芬蘭學生為例，芬蘭學生在澳大利亞是地位較高的群體，在學業上取得高成就，然而在瑞典的芬蘭學生是地位較低的團體所以學業成就較低。在台灣也有類似的例子，比如說歐美的外籍家庭小孩就反而具有學習優勢，和我們所認知的「外配小孩」有完全不同的處境。因而Cummins提出賦權(empowering)學生的理論，學校以及教師賦權給學生，能提高能力、增強信心，激勵學生取得學業上的成功。因為發展了文化認同的自信和適切的校本知識的互動結構，完全能夠勝任並參與老師的指導。而那些被剝奪了個人權力或者被說成是「失能的」學生就不具有這類型的認知、學術和社會情感基礎來進行學習。

至於多語言教育如何進行?實際上可以加拿大成功的多語教育課程來參考。

加拿大的法語和英語的沉浸式教學自 1965 年推行以來，現在普遍實施於全美各地。除了法語外，移民立國的加拿大提倡移民者的各種語言都是國家的資產，盛行傳承語言教育(heritage language)。在加國至少有 80 餘種傳承語的沉浸教學利用下午放學後以及周末，以浸泡在語言內的方式來學習第二語言，是以第二語言作為上課的媒介而不是上課的目的。其特徵就是不以第二語言為一學科，而是以該語言作為授課語言來進行一般學科(數學、社會、生活等)的學習。這 40 年的口碑和成效，實值得我們效法。

## 參、結論

最後，我想分享另一個台灣國內成功的雙語以及跨國婚姻的案例來做結束。以台灣台、日婚的子女教育為例，根據伊藤佳代(2014)的博論，台、日婚的國小子女的日文能力不輸日僑學校的學童，日文能力能達到和中文能力相當的程度。那是由於在台灣社會對於日文的接受以及喜愛的程度高的背景下，再加上日籍母親們自主的致力於投入傳承語教育的組織和教學、堅持傳承日語的成果。如果國人都能具有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的學習是可以相輔相成的知識，家庭、社會和國家教育體制共同來認同並支援新住民母親們傳承其子女語言，東南亞語言才有可能作為本國資源，發展出豐富多元且正向的移民國家。我們很清楚的知道，不是出生在雙親擁有不同語言的家庭就自然的能孕育出雙語人，處於邊緣化的族群更難能認同其語言文化進而傳承。我們也看到，如果母語的傳承真的只是各自家庭的責任，只要要求家長在家裡多說母語就好的話，台灣語言也不會都面臨邁入死亡的危機。台灣作為移民的接納國，政府以及整個社會對移民語言以及它背後所代表的文化，都要能夠有足夠的接受度，才有可能推展成功。

## 參考文獻

- 伊藤佳代 (2014)。台灣台日跨國婚姻的語言傳承教育策略—以日籍女性的語言意識形態分析為中心 (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
- 夏曉娟 (2003)。從全球化下新女性移民人權反思多元文化政策。《網氏/罔市女性電子報》，157。
- 王宏仁 (2001)。社會階層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1，99-127。
- 蔡政宏 (2007)。台灣人口政策的歷史形構。《台灣社會學刊》，39: 65-106。
- 陳麗君 (2011)。跨國婚姻和語言的初步研究 -比較台南市日籍和東南亞籍配偶家庭。《區域知識與文化形構》，頁 238-264。台北:群學出版社。  
<http://myweb.ncku.edu.tw/~lekun/site/o5-201104.pdf>
- Brenner, J. & Laslett, J. (1991). Gender,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women's self-organization: Considering the U.S. welfare state. *Gender and Society*, 5: 311-33.
- Cummins, J. 馬麗梅譯 (2011)。賦權少數族裔學生：一個干預框架。《當代教育與文化》，3(4)，1-11。(Empowering minority students: A framework for intervention)

King, R. (2010). *The Atlas of Human Migration Global Patterns of People on the Move*. London: Earthscan.

Piper, N. & Yamanaka, K. (2008). Feminized migration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nd the securing of livelihoods. In Piper, 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Gender and Migration: Livelihood, Rights and Entitlements*. New York: Routledge.

伊豫谷登世翁 (2001)。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と移民。有信堂。

澤田佳世 (2010)。超少子社会・台湾の「男性化」する出産力とジェンダー化された再生産連鎖—国際結婚と人口政策をめぐって。《国際移動と「連鎖するジェンダー」再生産領域のグローバル化》, 作品社。